

茅盾 蔡元培

费孝通

潘光旦

茅以升

马约翰

潘序伦

张含英

沈尹默

顾颉刚

林砺儒

梁实秋

李 凌

钟敬之 张仲鲁

苏河之王 叶友直

周作人 陈左高

黎诒远 魏寿昆 圣小东 祝文白 蔡世英 冯秉铨

胡传揆

夏德清 杨廷福

邓家栋

薛尚实 陈左高

过去的学校

(回忆录)

过去的学校

钟叔河 朱 纯 编

蔡元培	茅以升	费孝通
顾颉刚	茅 盾	张含英
潘光旦	马约翰	沈尹默
李 凌	林砺儒	潘序伦
钟敬之	梁实秋	张仲鲁
王 琳	苏润之	冯友兰
	等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过去的学校

钟叔河 朱 纯 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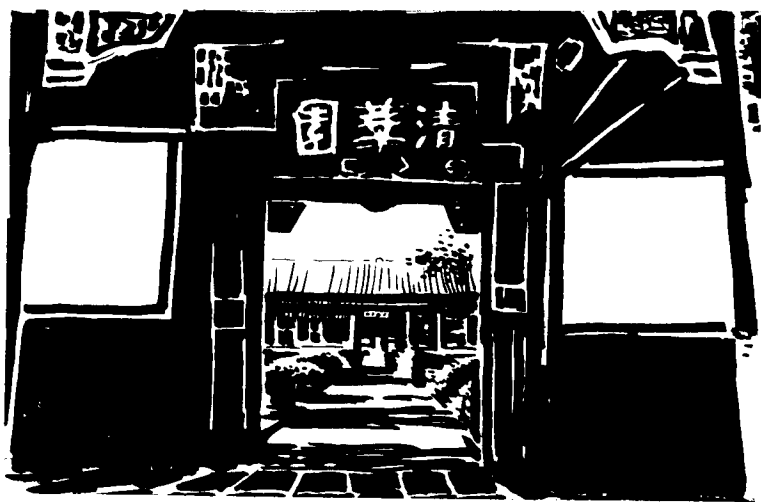
198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55,000 印张：19 印数：1—15,000

统一书号：7284·74 定价：1.85元



前“国立北京大学”门楼



初办大学时的
清华园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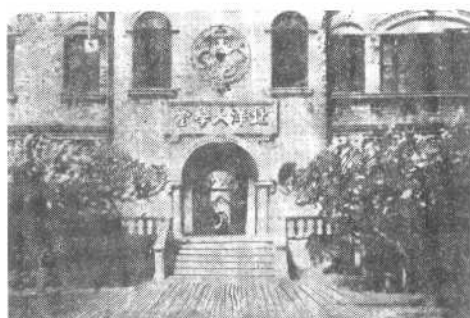
“水木清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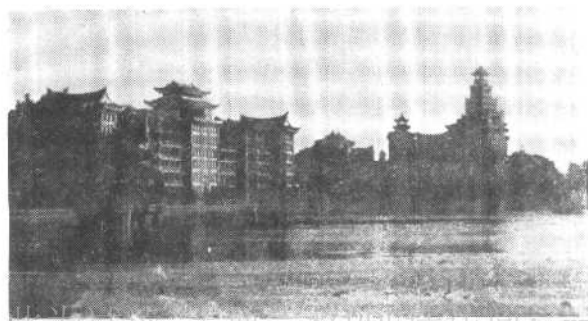
有名的南开大学
“大立镜”，镜上
悬挂着南开学生
守则。



“京师大学堂”门额



“北洋大学堂”正门



陈嘉庚先生创办的
厦门大学校舍

序

人都有自己的幼年、成年和老年。在幼年，大家都要进学校，到学校里学习知识，学习生活的本领和做人的道理。从小学到大学，起码得十五、六年。大学毕业，就算是成年了，很快又要为儿女进学校操心。这个操心的时期，又得十五、六年。老年人呢？家里总不会没有学生，还是得关心学校里头的东西。——且不必说千千万万终身在学校服务的男男女女，就是我们这些普通人，一生跟学校的关系也就够密切了。

历史是发展的，文化是延续的。一页一页的历史，要由一代一代的人来创造；一代一代的人，又得从一所一所的学校里教育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确实担负着对于历史和文化，也就是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巨大的责任。

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伟大民族，我们民族的学校也有悠久的历史。中国第一部通史，司马迁的《史记》写道：“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庠序，也就是古代中国学校的称呼。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在雅典和亚力山大城跟学生对话的时候，孔墨荀孟等人在齐鲁等地也有“从属

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的盛况。北宋初年建立在江南的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论起资格来，并不比牛津、剑桥、爱丁堡等不列颠的三大学逊色。

诚然，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学校，不可能不带上时代的烙印。但是，难道我们的祖宗就没有干过一点好事？难道他们留给我们的就只有债务而没有遗产？欧几里得给普多勒迈一世讲授的几何学，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作为教材。当这位威权赫赫的国王问欧几里得有没有办法把假设和求证搞得更容易一些时，欧几里得的回答是：“大王！通往几何学是并没有御道的。”而我们的孔子也实行过“有教无类”的方针，他最器重的学生颜回在陋巷过着“一簞食、一瓢饮”的生活，也似乎不大象一个奴隶主，因为奴隶主是不会搞“三同”的。

《过去的学校》的“过去”，并没有追溯到那么远，大体上是从清末维新变法、初设新式学堂的时候写起。而写这些“过去的学校”的老先生们，象蔡元培、沈尹默、刘仙洲、茅盾……，也多是“五四”时代的人。他们或者是“五四”时代的校长、教师（如蔡元培），或者是“五四”时代的学生（如茅盾）。也有晚于“五四”时代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抗战时期的都有，老解放区的同志也有。下限则断在一九四九年，也就是建国以前。建国以后，那就只能说是“现在”，不能叫“过去”了。

这一段“过去”是刚刚成为过去的时光。它隔我们还不很远，也就是一代人、两代人以前的事情吧。这是现代学校（讲授现代自然科学，用现代方法研究传统文化，同时注意到德育、体育和美育的学校）在中国草创的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的阶段。除了解放区和地下党主办的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学院）外，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些学校里暂时还没有成

为事实。正因为如此，因为是草创阶段，因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些“过去的学校”当然不能是完美的，不能成为我们今天办学的样板。但是，它们毕竟是我们父辈和祖辈们努力的成果，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前驱。看一看这些文章，看一看过去的校长是怎样当的，过去的教师是怎样教的，过去的学生们是怎样学的，他们有过哪些失败的教训，又有哪些可取的经验，这对于今天的校长、今天的教师、今天的学生，以及一切关心学校教育的人们，难道不是既有兴味又有益处的事情吗？

蔡元培先生逝世时，毛主席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张伯苓先生逝世时，周总理专程到天津张宅吊唁，叹息“先生死得太早了！日后新中国的伟大建设和伟大的教育计划，先生是看不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就是这样看待创办“过去的学校”的前人的。

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当然也就不会有将来。回忆过去，正是为了将来，为了现在。今年是一九八二年，距张伯苓先生逝世已经三十多年，距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也已经六年多了。对于新中国的伟大建设和伟大的教育计划，我们这些中年人、老年人和青年人都是有责任的。编辑这本《过去的学校》，也就是想来略尽一分责任。区区此意，读者鉴之。

钟叔河

1982.7.15于长沙

目 录

序钟叔河 (1)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 (1)

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顾颉刚 (10)

可贵的师生情谊

——记蔡元培和许德珩牟小东 (18)

我和北大沈尹默 (30)

报考北大前后茅 盾 (45)

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冯友兰 (55)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潘光旦 (67)

忆清华(节录)梁实秋 (108)

我在清华教体育马约翰 (121)

刘仙洲与清华黎诣远 (129)

从清华学校到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 (141)

回忆我在北洋大学	茅以升 (171)
北洋大学回忆片断	张含英 (177)
严格——北洋的学风	魏寿昆 (185)
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	北洋大学校史编写组 (190)
我父张伯苓办南开	张锡祚 (217)
早期的南开中学	黄钰生 (241)
西南联大始末记	李钟湘 (260)
陈嘉庚厦门办学	余 钢 王增炳 (291)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拾穗	林砺儒 (299)
抗战期间的浙江大学	祝文白 (308)
中山大学工作三十九年见闻	周鼎培 (315)
暨南大学杂忆	蔡世英 (327)
我国最早的农科大学 ——直隶农务学堂(河北农业大学)	苏润之 (335)
焦作工学院始末	张仲鲁 (355)
回忆岭南大学工学院	冯秉铨 (367)
“协和”的创办	胡传揆 (371)
忆湘雅医学院院长张孝骞	邓家栋 (387)
无锡国专杂忆	杨廷福 陈左高 (389)
立信会计学校的创办和发展	潘序伦 (399)

记晓庄学校

- 兼忆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王 琳 (415)
- 陶行知和社会大学 夏德清 (465)
- 从育才学校音乐组谈起 李 凌 (477)
- 回忆贵州达德学校
- 纪念老教育家黄齐生 张笑尘 (487)

革命的大学——上海大学 周启新 (500)

回忆上海大学 薛尚实 (520)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侧记 钟敬之 (530)

留英记 费孝通 (560)

谈留美生活 潘光旦 (593)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括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学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人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

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止有从聘清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得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沈”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

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线，常常为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

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它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于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

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